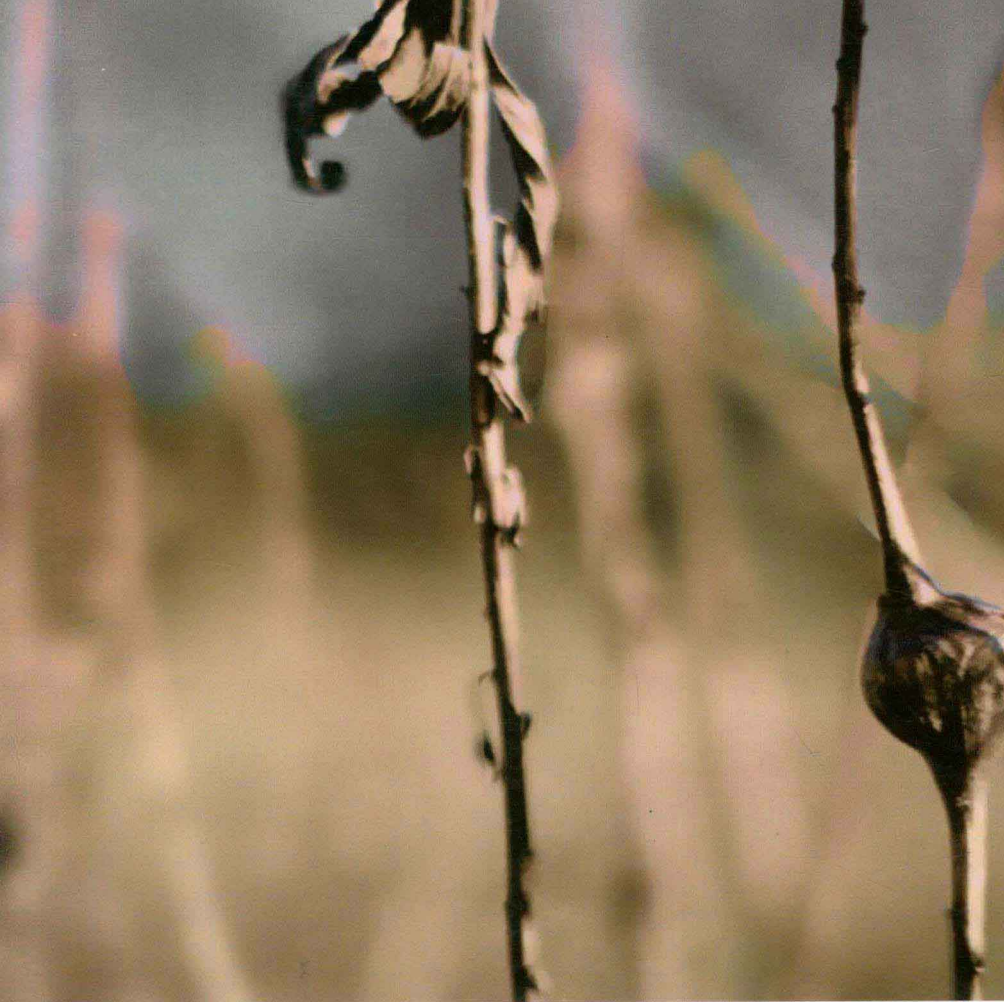




飄泊中的永恆

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

喬健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飄泊中的永恆 / 喬健 著

--初版.-- 臺北縣永和市：Airiti Press, 2010.2

面：公分

ISBN 978-986-6286-07-0 (平裝)

1.文化人類學 2.田野工作 3.筆記

541.307

99001695

飄泊中的永恆

作者／喬健

總編輯／張芸

責任編輯／呂環延

版面構成／吳雅瑜

封面設計／鄭羣潔

校對／張安怡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發行者／Airiti Press Inc.

地址／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電話／(02)2926-6006

傳真／(02)2231-7711

Email／press@airiti.com

帳戶／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帳號／045039022102

ISBN／978-986-6286-07-0

出版日期／2010年2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NT\$400元

©Airiti Press Inc.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飄泊中的永恆

—— 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

目錄

- 5 寂寞的人類學生涯（代序） 李亦園
- 13 初版自序
- 17 增訂版自序
- 21 威羅奇國＜一個消失在廿世紀的印第安文明＞
- 29 美森危地＜印第安人的崖居遺址＞
- 37 普埃布洛人＜太陽神型人格的代表＞
- 45 拿瓦侯族＜北美洲最大的印第安族群＞
- 53 在拿瓦侯保留區展開田野調查
- 61 犬的傳人
- 67 千家峒＜瑤族的桃花源＞
- 73 飄泊中的永恆＜瑤族對遠祖居地的思戀情結＞
- 79 女書＜在湖南江永縣發現的一種只流行於婦女間的古文字＞
- 89 火狗舞＜廣東龍門縣藍田瑤族的中秋祭典＞
- 95 廢墟中的生命＜訪粵北瑤族的火燒排舊址＞
- 107 排瑤的婦女
- 115 坳瑤的婚姻制度
- 123 飄遙過海
- 129 滇南行
- 137 廣東與福建的畬族
- 145 惠東女子不落夫家
- 附載：
- 155 冷門裡的大學生活
- 179 人類學家與原住民研究：一些個人的經歷與反思
- 205 引用書目

寂寞的人類學生涯（代序）

李亦園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喬健教授是我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學弟，他晚我幾年進入人類學的領域。人類學是一門冷門學科，系裡的學生非常少，所以喬健兄說他在校時是一班一個人形影孤單地唱獨角戲唱到畢業，而我就讀的這一班（考古人類學系第一班）也比他好不了多少，連我共只有二個人，雖不至於形單影孤，但也是十分冷清。我們在學校時常常說我們這一班開班會每次都全到，畢業後則開班友會也每次都全到（因為只要有一人不能來就不開了）。不過，現在我們永遠無法再召開班會了，因為我的唯一同班同學唐美君教授（考古人類學系第四班系主任）已於 1983 年逝世了，所以我也和喬健教授這一班一樣，永遠是形單影孤了！

學人類學的人不但在學校裡十分孤單寂寞，畢業後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人類學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調查探索，無論是蠻荒異域或者是窮鄉

僻壤都要去住過一年半載，並美其名叫「參與觀察」，認為只有這樣長時間地深入於其中，才能真正徹底地了解你所研究社群的實情。但是在那樣的蠻荒或偏遠地區而又人生地不熟之處，一個人單槍匹馬要去住一年半載，不但孤單寂寞，而且甚至於危險萬分並有生命危險，所以喬健兄在描述他的拿瓦侯印第安（Navajo Indian）村落之行時就說到土著懷疑他是間諜，並且揚言要殺掉他。在講到採訪廣西省的坳瑤族時，也說到 30 年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也就是在此地調查時出事，其夫人王同惠女士因而遇難的故事。可見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確是十分辛苦而寂寞的。我自己早年在高山族的泰雅族中做研究，曾走了兩整天才到達一個叫金洋的小村落，在那裡前後住了數月，寄信回家時郵票被偷掉了，家中和研究所的同事們急得不得了，以為出了什麼事。另一次去砂勞越做調查的時候，一個人沿拉讓河（Rajang River）而上去住在達雅人的長屋裡，回想起他們從前是獵頭民族，半夜裡有時聽到鼓聲也不免心驚。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Malinowski）是長期田野工作的創始者，他在太平洋的小島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做研究，前後住了快四年。在那種蠻荒孤島上一個人住了那麼久，有時候煩躁起來真是要發瘋，所以馬氏在他私人日記中有時竟會詛咒那些他原本很心愛的初步蘭土著。他死後其夫人將日記出版，且曾引起人類學界的一些風波。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人總是人，人類學家在田野一久，總不免有些牢騷，那就是源之於長久的寂寞之故。

但是人類學家為什麼要這樣自我放逐似的去備嘗田野的孤單寂寞呢？那是因為田野調查實在有其吸引人之處，尤其是面對異民族文化之時，所引起的那種文化衝擊或文化震撼，經常是使你終身難忘，甚至於刻骨銘心。喬健兄的這本「田野筆記」，就是把他 30 年來在北美洲、中國大陸做田野時所遇到的種種震撼，以及辛苦與寂寞，以輕鬆的筆法寫下，娓娓道來，至為生動感人，不但可吸引並滿足一般讀者的好奇之心，而且連我這老田野也為之心動不已。

喬健兄的田野經驗比我廣闊，早年我們同樣是以研究高山族出家，後來我做華僑研究以及台灣島內漢人社區的研究，但是他卻有機會跟隨他的老師 John Roberts 教授（也是我的老友）去跑遍了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保留區；而離開美國後，因為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教職，所以比我們更早有機會去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區域做調查研究，其經驗就更為扣人心弦，而因此所發出來的分析與議論，甚至於對文化的種種詮釋、注解，都值得無論是專業的人或一般讀者的細心一讀。

喬健兄在寫他的第四篇拿瓦侯印第安遊記時，曾說到一則拿瓦侯人調侃人類學家的笑話：「一個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親（他們是母系社會）、父親、子女和一個人類學家。」這是因為人類學家很喜歡以拿瓦侯族為研究對象，所以研究者不斷

進出他們的村落，拿瓦侯人覺得很不耐煩而造出了這一則笑話。還有另一個調侃人類學家的笑話：「美國早期人類學家克魯伯（A. R. Kroeber）寫過許多有關印第安人的報告，有一次他又到一個印第安人家中去訪問，問一個報導人問題時，那人總是要回到房間去一會兒再出來回答，克魯伯很奇怪，問他是不是到房間去轉問他母親，那印第安人答說是去翻閱一個人類學家克魯伯的報告，以免把自己的風俗說錯了！」從這兩則笑話裡我們可以看出土著民族對人類學家的複雜態度。人類學家長久地停留在他們村落，為了要深入了解，所以無所不問，無所不談，真的常常是打破砂鍋問到底。記得有一次我的助手四度去訪問一位村中的婦女，前三次都被拒絕了，第四度再去時勉強接受了，但脫口而出的話是：「你怎麼這樣陰魂不散啊！」人類學家不僅寂寞孤單地做田野，而且隨時有遭白眼或調侃的機會，所以喬博士在拿瓦侯區調查時，拿瓦侯人會對他說：「你的研究對你有好處，對我們卻沒有好處。」「你是從那麻煩最多的地區來的，我們怎能信任你呢？！」

其實，人類學家做研究，有時並不一定對自己有好處，他也不一定在意於是否能對自己有好處，但是心中所想的卻大半是如何對土著或被研究的人有一些好處。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人類學家長久時間地做參與觀察，其目的就是希望能了解土著內心的所思所好，藉以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向世人說明他

們的文化、狀況與心理趨向，以免文明人城市人錯解了他們的心意，而把自己之所愛硬安到別人的身上，而且自以為是「人道主義」。比如說，從前有一位大官到蘭嶼去視察，看到雅美族人所居住的半地下屋以為是落後貧窮，有礙觀瞻，所以下令替雅美人蓋了一排排的鋼筋水泥「國民住宅」，沒想到這些「現代化」的住宅都不為土著所喜愛，一間間變成養豬的屋子。這位大官沒有上過喬博士的人類學課程也沒有人給他有關台灣高山族的知識，所以他不知道雅美族人的居住房屋構造有適應地理環境、調適氣候、表現社會地位等種種功能，而且他們的房屋組合也分住屋、工作屋、涼亭、船屋等類別，不是簡單的一小間鋼筋水泥屋就可解決事情的。又如前些時候花蓮山地雛妓的事鬧得很熱，大家都為土著少女的遭遇而嘆息同情，但是一般人心中總留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疑問：「山地女孩總是比較隨便吧！」其實這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種大漢沙文主義在作祟，因為就以花蓮泰雅族為例，他們固有的貞操觀念有時還比我們漢族更嚴格！還有更可笑的是前兩年行政單位受了「復興中華文化」的影響，要在山地各民族推行做族譜，他們腦子中以為所有的民族都像漢族一樣有父系家族氏族制，而不知道高山族中有好幾族都是「雙系」或「無系」的親族組織，如要做族譜則四代以上就有 16 個譜系，這如何做連我們這些譜牒行家也想不出來！人類學家就是這樣站在土著文化的立場為他們說話，為他們的處境與內心思維作闡釋，並企圖扮演他們的

代言人，但也因此而犯了行政當局之忌，不為他們所喜歡，甚而說我們是偏袒少數民族。人類學家對少數民族的心結就是這樣複雜而糾纏，我們覺得他們是少數，所以意見常被忽略，所思所想常被抹殺，利益常被忽視，現象常被誤解，所以經常要為他們說話，為他們爭取權益。我們不但為文化上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Cultural Minority）而說話，我們也為社會上的其他少數或弱勢群體（Social Minority），如女性、老人、少數宗教團體、殘障者等而說話，並為他們爭權益，因此常常就會被誤會是異議分子，甚至被譏為吃裡扒外，並為行政當局所不喜歡；學術主管嫌我們愛管閒事，或說我們不務正業；行政主管怕我們抬出「憲法」、「部落公約」等等來找他們麻煩，所以厭惡之至而避之唯恐不及。人類學家就是這樣不自討好的人，寧願形單影孤地到蠻荒之地過寂寞生活，做研究時土著對你不耐煩，威脅要驅逐你，做完研究寫成報告後行政主管們又討厭你詛咒你，難道人類學家真的喜歡這樣的寂寞生涯嗎？

其實人類學家並非真的是喜歡寂寞生涯，人類學家之所以樂於奔走於蠻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與行政人員的譏諷，原也只是為了一種信念，一種遙遠的理想在鞭策著他，就如喬健兄在書中《飄泊中的永恆》一篇所描述瑤族人追尋他們的千家峒一樣，人類學家只是在追尋他們對人類永恆本質的信念。瑤族人在元成宗大德九年，也就是公元 1305 年 3 月 19 日，元兵

攻入湘西的千家峒老家，他們的祖先棄峒而四散逃走，並把原來供奉的神祇埋在地下，乃發願五百年後子孫再回來相聚朝拜。千家峒原是一個瑤族人像陶淵明詩中所描述的桃花源那樣的人間樂土，這代表瑤族人對固有文化及其發源地的一種懷念之情。這種人間樂土的懷念之情經過傳說沿誦以及儀式扮演，不但久已成為瑤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形成類似人類學典籍中所描寫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或「復振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或者像基督教中的千年福崇拜（Millenarianism），追尋天國復臨之福一樣，他們不斷地要找到千家峒老家。喬健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重返千家峒的運動在近代不斷發生。1941年廣西大瑤山地區的盤瑤盛傳千家峒出了盤王要帶瑤族回去。這年農曆八月初一大批瑤民聚集在廣西忠良縣山界村，敲鑼打鼓地出發往千家峒，當地政府以為瑤人造反，派兵鎮壓，並把幾個帶頭的人抓起來。1957年廣西岩城的瑤人傳說在湖南找到千家峒……消息傳布開來，迅速形成一大規模的千家峒運動。但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主事人）周先隆被打為「地方民族主義」及「現行反革命」，判刑15年！

這種的故事在人類學文獻中極為熟識，而在台灣我們也很容易看到類似的例子，基督教中的一個新教派，傳言在中東的聖山「錫安」（Zion）已「遷」來台灣南部，於是形成一般朝聖熱潮，最後行政當局懷疑他們要「造反」，終於派人取締他們。

這種對遙遠理想之國的追尋，應是人類的共同現象，在宗教活動中層出不斷，在受壓迫的少數族群中更是此起彼落，在知識追求的領域內，對於理想範式（Paradigm）的追尋也不斷翻新，人類學家執著於人性普同本質與文化歧異的追尋，就像瑤民的千家峒尋根，或是基督徒的找尋天國復臨的運動一樣，忍受寂寞與困難，鍥而不捨去追求他的理想。然而他與宗教徒或少數族群也有不同之處，他們用理性與科學，而不用傳說或巫術，去追求理想之國，所以其歷程雖然寂寞，但是理想之國終有一天會到臨的。

寫於 1990 年 6 月 23 日颱風之夜

初版自序

1987 年底，時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李亦園院士邀請筆者前往擔任「洪建全文教基金講座」。那時台灣對大陸政策正開始開放，大家對大陸的事物興趣正濃。筆者便結合前此不久對廣東排瑤、廣西坳瑤以及福建惠東婦女的田野調查，於 12 月 16 日在該院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做了一次公開演講，作為「講座」活動的一部分，講題是《婚姻制度與個人自由：三種社會，三種選擇》。恰逢《張老師月刊》王桂花副總編輯索稿，筆者便把這講稿連同有關照片交給她發表，全文在次年 2 月出版的第 122 期《月刊》上刊出，無論是文字的編排或彩色照片的素質，都使筆者讚服不已。另一方面，《月刊》的編輯們又催促著繼續寫，於是筆者把歷年田野調查筆記及照片整理成報告散文斷續在《月刊》上發表。直到 1989 年 11 月出版的第 143 期《月刊》為止，共刊出了 14 篇，於是連同原在《聯合報·萬象版》（1988 年 6 月 17 及 18 日）發表的一篇〈犬的傳人〉，集結成一冊由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因為這 15 篇都由亦園兄邀我作演講而起，所以這一小集，便非請他寫序不可；他也慨然應允，而且很快地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0 年 7

月 1 及 2 日) 刊出了他洋洋灑灑的序言〈寂寞的人類學生涯〉。

這 15 篇原來刊出的題目大都是報刊編輯們改擬的。在這小集裡，筆者又把大部分的題目改了或加上副題。內容方面，除了把錯字改正外，也做了一些小的修改。修改最多的地方是把人名的中文譯名去掉，只用英文代表。筆者認為英文在今天中國社會已很普遍，大多數人都會英文字母。與其把西文人名作冗長的中譯，不如只用英文，讓讀者們容易追認。又為了使讀者正確了解每篇內涉及的相對時間，在每篇之後都注明原來刊出的年月。每篇所附的照片也更換了不少。

亦園兄說人類學的生涯是寂寞的，因為這個學科是冷門而且為了田野調查更往往須去到蠻荒異域或者是窮鄉僻壤。筆者自己則感到人類學生涯的另一個特色——「飄泊不定」。這裡有兩層含義：一是生活上的，因為人類學者必須做田野調查，常要遠離家門，居無定所；另一則是思想上的，不少人類學者的研究興趣都是不斷變化，可以忽而親屬制度，忽而文學藝術；忽而非洲的一個初民部落，忽而亞洲的一個現代都市。Lévi-Strauss 把這種習慣叫做新石器時代人的習性。他在其所著《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中說，就他自己來說便很不習慣在某一塊園地上謹慎耕作而年復一年地都從園地裡收成，而是喜歡放把火，燒開一塊新園地，幾次收穫之後，便又移向新

的荒地。筆者首次與瑤族接觸，便深感他們的游耕生涯實在是上引 Lévi-Strauss 那番話的具體寫照。而且更進一層，大部分瑤族一方面固然是飄泊無定，但另一方面卻對他們歷史上或傳統中的遠祖居地有著永恆的思戀。於是筆者寫了本集中的第八篇——〈飄泊中的永恆〉。人類學者在不斷改變他們的研究題目，卻也在始終不懈地尋求一種恆久的東西——人類思想行為的基本規律與結構——這種東西要比瑤族的遠祖居地更為古老。於是筆者便用這篇名作為這集子的書名。Lévi-Strauss 接著說人類學給了他知識上的滿足，因為它把處於兩個極端的世界史與個人史連在一起了，而且顯出了兩者間共有的理性。筆者自己的經驗是這種滿足只能在田野調查中獲得。當筆者觀察了尤特族（Ute）的遠祖在落磯山（Rocky Mountain）上走過的古道，再去訪問普埃布洛人（Pueblos）祖先在美森危地（Mesa Verde）所留下的崖居遺址，突然感到，筆者與千千萬萬的亞洲人，不正是在重複著荒古以來人類一直在進行著的從亞洲跨越太平洋到美洲尋找新的生活的活動嗎？一剎那間不禁感到一股滾滾洪流從遠古奔向未來，通過田野實地經驗，使筆者清楚看到自己在這歷史洪流中的位置。田野調查因而不只是收集材料的一種手段，而是對自己與世界獲得更深更廣認識的一種過程。

有的人每做完一次田野調查便可寫出一本書來，筆者卻沒有這種能耐，結果是積存了大量的筆記與照片，將來終難免與